

关于教育中的混血：远东与西方的往来¹

巴黎第八大学名誉教授 雅克·阿德瓦诺

教育，尤其是更具时效性的教育学和教学法，更容易受巴洛克风格而不是古典传统的影响。按照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说法，建筑的设计者、施工者、奠基者，作为理想的传播人，他们的形象可以在其中形成一种恰当的隐喻，又不破坏已有的秩序，理性将因此而长期成为它的支柱。近几十年来，科学为人们所追逐的价值担保（冒着经常混淆和目的性与目标的风险），主要受技术、经济和市场影响的革新毫无困难地遵循着这一运动。学校就是这样产生的，然后又向教育系统各个复杂的层面扩展。此种模式往往对几何精神有利（与敏锐感相比），继续从笛卡儿的世界观汲取营养，为积极的艰苦做好了充分准备。忽而是援引的“规范”，忽而是被正式发现和检查的运行规则，它们保证了这个整体的一致。而后者，则因此而一下子就提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当然，主要是从“非常规性”、个性、特性、繁琐性无限增加的时候开始，《论方法》（把复杂和简单对立起来，把前者简化为后者）的“康庄大道”才遇到了它的局限，恢复了复杂性的地位，从根本上重新提出了我们的知识模式问题。在我们看来，对不同专业以及各专业内部不同应用领域，根据其各自范式和方法论所使用的语言的分析，至少是对我们“所不知的东西”的绝好分析的一部分。在涉及到公理体系和公理化的时候，人们永远不愿意减少这些不知。本文就是要进行这样一种分析，而不是在鼓吹未来的现代主义者所钟爱的“新人”或“23 世纪的教育”方面浪费笔墨。

一. 妨

异质性（指状态的名词）和异质的（形容词）这两个术语的用法多种多样。帕特里克·托尔（Parick Tort）的《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词典》²对异质性作了如下定义：“一种综合起来的物质的集合状态。在综合过程中对材料以及运动进行

¹ 全文发表于 2001 年 9 月在巴西举行的研讨会及《教育科学研究年鉴》，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2001。

² 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96。

的正常连续的二次重新分配作用下，结构（或功能）发生分化。从总体上讲，进化本身可以定义为从初始的漫射同质性走向协调且综合的异质性的过程，它包含了来自力量持续-集合体内部变化的首要原则-的形式、结构和功能的各种分化，而集合体则总是另外处于插入力量的作用之下。”

我们这里暂时从化学（这些术语在其中较少使用）和物理（尤其是在核裂变方面）领域的应用中所得到的，一方面，是一些现象可以在其中的一个“水平上”（宏观）被视为异质，在另一个水平上（微观）被视为同质，或者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当被称为“异质的”时候，它们指的是一些状态，而且不管明显受到“检查”和“控制”的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如何，这些准备工作所要达到的物质状态可以在诱发或意外事件中变得极端、泛滥、夸张、无法控制。

《哲学专业与批评词汇》³指出，一个整体内“不管带有什么差异，特别是结构和功能差异的”那些部分之间是异质的。《哲学大百科全书》⁴则以乔治·巴达耶（Georges Bataille）的思想（“杂质学”或“粪便学”）⁵和朱丽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的思想⁶为基础，把与纯粹、混杂、相异、主权、依附、天赋、神圣密不可分的异质性，变成了一种“彼世”，而不是思想的超验性，变成了“不仅不能压缩为任何形而上学思想，而且也不能压缩为任何在封闭的系统中确立目标的行为的”存在的根本矛盾。尽管通过语言实现，比“否定”还要“否定”，异质性的智慧绝非七拼八凑，它是“语言可能有的外在与语言本身的斗争，因而也是与语言的辩证”⁷。另外，同一本辞典把作为名词和形容词的“异质”对立起来，有如亚里士多德对数量和质量，后来的亨利·伯格森对“时间”的概念，引向“集约大小”和“广延大小”的思想⁸。还有其他许多说法。我们和安德烈·德·贝雷迪（André de Peretti）合写的一本书⁹，讨论了异质性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教育科学当中的位置与身份。

我们认为，异质性和异质的强烈意义与其它许多相近的词汇不同，它们植根于生物学，即生命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中，我们仅把它们用于这些

³ 安德烈·拉郎德（André Lalande），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47。

⁴ 安德烈·雅格布（André Jacob）主编，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2001（第一卷，1136-1137页）。

⁵ 《全集》第2、6卷，异质学的有关部分，Gallimard出版社，巴黎，1970。

⁶ 《多面手》，Seuil出版社，巴黎，1977。

⁷ 同上。

⁸ 见安德烈·雅格布，同前。

⁹ 《思考异质》，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巴黎，1998。

有关的方面（机体、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人种学、人类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而形容词“拼凑的”来自 *Klinein*，即倾斜、拒绝，指某些与其它成分组合在一起，同时又违背整体规则的东西（比如，从语法上讲，*aller* 由于它变位的不规则而成为一个拼凑的动词……）。

这样，异质性和异质便与同质性和同质相对立，以一种唯一的、具体的或抽象的“自然”为前提，符合大部分力求客观的科学，更符合逻辑学、数学、力学或后者在当代的延伸（电子学、信息学、控制论）的范式。尽管很快就后悔，笛卡儿还是假设，一方面在自然、人体和空间之间，一方面在思想和理性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异质性。现代世界又重新提起了这一争论，这次更为广泛，从它对人类行为学和管理学的兴趣出发，在一种越来越发达的**工具性理性**的帮助下，处于各种性质的全球化-世界化企图的大肆泛滥的背景之中。我们正在全面地经历着一种同质化的“狂热”。我们认为，对于异质性和异质概念的建构，在哲学方面最根本的，是必须从一开始就不折不扣地参照相异性的概念及其价值。在此，“另一个”不同于“差异”。后一个概念的使用，有利于分开、区别，但不能得到“相同的”。这样，有必要区分两种形式的复数（相对单数而言）：一个是纯粹的同质性（更为“客观的”成套或“成批”），一个是异质性（争论、冲突，至少是在主体之间）¹⁰。

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组织、管理、领导，自愿地过分“机械化”。这也是各种功能主义经济学的原则。作为理性人的一个种类的经济人，走到了生物人的前面。在这里，生命的时间和哲学的时间被边缘化、压缩、不为所知，从而让位于物理的、同质的、空间化了的（笛卡儿、加贝尔）、通用的（牛顿）钟表时间，以便测量和计算（编年学和测时学）。根据这种看法，不论是具有方向和目标的“方案”、“规划”，还是实现目标的战略，都不能以相同的方式设计和表述。而当问题更具明显的伦理性时，受到优待的，可能分成等级的那些价值，就更为不同。

再深入一步，这次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古老又常新的纯与杂的题目，密切地与异质性和同质性的深层意义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研究后两个概念，深化二者意义的亲缘关系，是一种有趣和有益的旅行，其最终目的是把这些集合与教育更为复杂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¹⁰ 见雅克·阿德瓦诺：“冲突表象和地位的演化：多参数研究”，载心理学报专号《冲突》，巴黎，1990；亦见阿德瓦诺与亨利·沃格朗（Henri Vaugrand）的对话：《复数的异质性》，X-alta, Estandeuil 出版社，1999。

二. 垢

从辞源学上讲，法语的形容词“纯”与“杂”13世纪时来自拉丁文，于14-15世纪确定，然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派生词：纯化、纯粹主义、清教徒、清帐、提纯、清样。纯的意思是，干净的，清晰的，没有斑点，没有污迹，既指心理又指身体，任何不同于其本质的东西没有对之形成影响和“感染”。之后，这一“理解”又加进了“没有混杂”，从而和正直、不妥协、甚至贞节、同质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反义词是玷污、腐败、贪婪、罪恶、反常、混杂……。人们既说灵魂之纯，也谈天空、声音、音乐、蜂蜜、宝石或水之纯。在科学领域，也有“单质”和相对应用科学而言的“纯科学”。就像音乐在艺术领域一样，数学在科学领域自然就成了关注推理的最纯的科学。

词汇实际上就这样无限地“延伸”下去。但是，不管用法怎样，脱离开它的具体环境，这一概念总还是或多或少地根据其本体论特性及价值哲学特性，归纳出一种价值等级的认识：纯优于杂，更为可取。这样，同一性质的语义混杂就很容易地出现在干净-肮脏、卫生-不卫生之间。研究人体和运动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乔治·维加莱罗（Georges Vigarello），就很重视这种对应关系，并且进行了研究¹¹。与形式逻辑一样，美学和道德也提倡纯（而伦理学和道义学却从不这样）。于是，在知性的层面上，明确、清晰、显著，便与混乱、含糊、蒙昧，甚至与一组矛盾的意义相对立。真理经常被说明所符号化，“揭示”、“公布”、“启迪”、“发现”、学术“引导”的期望便由此产生。有人认为，实在的或虚拟的，物理的或逻辑的空间，打破了哲学时间和生活记忆这些异化和渐变的征候，借助这一观点，纯和真理即使不是吻合，也是交汇在了一起。为了不至于威信下降和令人失望，英雄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

纯几乎总是更容易地出现在原初时期（工业领域除外，那里，原料进入设备，经过提纯和裂化等加工，可以得到更纯的产品）或“彼世”，所以要呼唤“失去的天堂”或等待“美妙的明天”，以回避现世的异化。于是，对“黄金时代”的怀念，甚至不朽灵魂对理念的回忆（这不一定是患了既往症），便成为我们的神

¹¹ 尤见《脏与净：中世纪以来的身体卫生》，历史界，Seuil出版社，巴黎，1985；《卫生与不卫生》，历史界，Seuil出版社，巴黎，1993。乔治·维加莱罗的国家博士论文题目是《直立的身体》，身体与文化，Jean-Pierre Delarge出版社，1978。

话的标志，而乌托邦则成为我们希望的基础。在故事和传说中，一切都发生或将要发生在“那个时候”。在以名著、成就、壮举、纪录为标志的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纯说到底是一种**超验**的标记，我们对它的向往从未停止。这也是好与坏的两分法。除少数特例之外，神比较纯，而魔鬼则肯定不纯。因此，宗教经常把这作为让人通过苦行在精神上走向神圣的基础，而西方的理性哲学（尤其是“启蒙哲学”）则把这和“本质”、“普遍性”联系在一起。

因此，人们首先被先于一切的“完整”性质所打动。这种选言性既被亚里士多德式的分析（在这里，“形式”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联系在一起）的准则逻辑所说明，又被布尔的现代信息学所表现，被这一概念的“不是全部就是没有”的这种“整体”面貌所修饰。而越是追溯古老的根基就越是如此，人们不会与之妥协。一点点和解也会即刻蜕变成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讲，安提戈涅就死于这种“引起强直痉挛的”纯。在康德之后，与对主体和美学的“丰富”评价相反，现代西方哲学中剩下的“纯”，是独立于感觉经验和存在经验，即独立于经验的东西。

从此，混血就自然被人从私生形式的角度去理解，同时包含着违规、谬误、混乱和病态。即使不受处罚，也只能被贬低。但是，这不应因此而混淆我们的视听。纯与杂之间复杂关系的明了性，要求一种形式的理解，即使不是更具辩证性，至少也是更具对话性。

于是，纯的观念自身就不无矛盾地带有生与死的对抗力，证明它在生物学方面的根基并不比异质性差。我们已经知道，从化学角度讲，纯的水和空气并不适合生存的需要。人要进食、消化、吸收、排泄（粪便）、渗出“体液”，注定要死亡，人体注定要分解、腐烂，所以人是最不纯的。在大部分文化当中，妇女被认为比男人更不干净，特别是因为她们有经期，从而使这一原则性差异正式地具体化。但是，通过养育子女，妇女又受到尊重，重新找回纯，有时近乎被神化。正如大多人种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在许多民族当中，肮脏与神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埃罗迪亚德到波尔布特，从纳粹到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以及图希族、胡图族和安哥拉的屠杀行动，人类历史上那些违背人性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都以纯为合理的根据。

提出上述概念（纯和杂）的初始想象基础令人担忧，因为尽管属于诸说混合

并且带有神奇色彩，它总是还要回避人们之后将要进行的合理化的尝试。即便是把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纯与杂还是无法分开（当然这不妨碍对它们加以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就像上帝与魔鬼成为善与恶的象征）。因为可以在不同人种交配的情况下具体认定，所以混血在自然方面更具经验性，但也不能被当作一种一般性证明的简单事实。根据这一原始的价值哲学，它作为经历过、承受过、感觉到、表现出来的东西，将长时间存在（在每个具体的经验当中）。因此，它首先表现为两个集团的分裂，而自己也感觉到被它们所抛弃。在一段时间里错误地期望“第三代”-过去各个阶段的一种“综合”，同样也是无济于事。应该在很长时间之后，承受而不是超越失去一致和感受**缺欠**所造成的痛苦，然后发现生物学和文化方面的一种复数的财富。多参数研究需要明确的前提，那就是一个认识、研究、行动的客体，要想变得可以理解和被人更好地理解，可以也必须属于若干不同的，需要时是对立的解释和观点。上面曾经指出，形容词“不同的”毕竟是不够的。这种专业的、理论的解释，实际上必须是异质的，确切说是**另外的**。把多维性和多参数性对立起来并加以区分的性质上的全部差异是暂时的。多维性总是按照期望的“尺度”，重新使它的“几维”或多或少地同质化；多参数性则服从异质性，不可能把一种参数压缩成另一种参数并加以统一（我们认为，乔治·德沃勒¹²的人种精神分析或人种精神病学的“互补性”就是多参数的）。于是，通过这样的定位，就可以对“其他”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有更广泛的理解。之后，在多样和互相对立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整体中，尤其是在教育和培训科学的集合中，产生完全异质的“范式”和知识模式（于是，培训就从培训者和被培训者最初的资源出发，逐渐变成了混血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实践）。质量方面的可理解性的财富，恰恰就来自那些不可调和，不可逆转，然而却可以相联的知识对立与冲突（比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当然，从继承的观点看，这些做法，这些“复数的知识”，不够系统，难以形成模式，更加复杂，会被视为“不纯”，“杂交”，“混血”，折衷。

¹² Georges Devereux: 《论互补性人种精神病学》，Flammarion 出版社，巴黎，1972。

三.

在被列为复数的科学（信息与通讯科学、组织科学、体育运动技术科学……）当中，受到那些更古老的或者从认识论角度被认为更高贵的学科（物理、化学、数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歧视，难道不正是教育科学的特点？如果说，许多认识，包括那些属于所谓“硬”科学的认识，今天必须重新审视它们当中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之间界限更为明确的传统关系，人们仍然继续把那些矛盾称作“悖论”，那么就应当说，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可信度受到使矛盾减少的复数形式的影响并非最大。受到令人嫉妒地保护的人类繁殖和夫妻关系，很快便遇到了族内婚的局限，面临着退化的危险。教育是一种由组织和机构完成的社会功能，更不必说它是被国家“几乎垄断的”特权机器，动员以此为业的公职人员尽量开发最大多数人的批判功能。以同时动员起来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行政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教育学、伦理学……的观点看，它只能被认为是矛盾的。如果在某些方面，教育总是提出对培训主体来说几乎带有根本性的身份问题，那么这个主体除去通过学校得益于知识与技能的普遍传递之外，他的个性和特性还需要通过经验（家庭的、社会的、职业的）在培养“生存”和发展能力方面有所**收获**。可是，千百年来的学校制度传统，坚持与基础知识相匹配的传递内容的普遍性，把学生看作千篇一律。为了更好地成批接待学生，出于组织管理的原因，把这种“节奏”（更具“集体性”和机械性）强加给了他们。尽管后者是活生生的人，最后也只能“学习”、“理解”、“关注”、“适应”、“吸收”、“熟悉”人们根据各自的速度、筛选和看法提供给他们的那些内容和数据。当然，结果就是不适应和失败。之后，再根据运气的好坏，采取个别补救措施。在同一个人身上，认知和情感的发展可以是矛盾和混乱的，经历在不同场合发挥作用：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想象的，它动员而不是引发注意力、灵活性、努力、兴趣、愿望、幻想。人际的互动和影响，社会的界限和权力关系，造成了许多冲突，使自治和授权难以得到¹³，而主体如果得不到后面两者又不能真正发展（成为施动者、表演者、作者）。教育的社会方面非常有利于对存在的适应，有利于文化适应，有利于**服从规律**，有利于承认必要的秩序，这些是在社会上生存和保持**人际关系**的起码条件。但是，**人际关系**从来也不能完全摆脱**违规**的冲动。后者在它们的单独或集体表现当中，

¹³ 参见阿德瓦诺的文章“授权”，载安德烈·雅格布主编：《哲学大百科全书》，同前（卷1，203-204页）。

根据看法、环境和理解的不同，既是进步和成功的源头（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也是悲剧和严重恶习的出处。在人类历史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那些冲向保守的疑问、暴动、革命或改革，就永远不可能出现重大进步。不过，为数众多的不服从和违规又完全无功而返和毫无意义。

为了使自己成为必要，组织和机构有不少自己的病理学：官僚主义，循规蹈矩，怕冒风险，因热衷于“这里和现在”而关注短期行为，结果是僵化，没有方向，无法设计出方案。因此，为了不使价值在这些特权过大的维度当中丢失，我们提倡的多参数观点是必要的。首先，教育是复数的，它贯穿人的一生，同时在家庭、学校、街道、电视、图书、工作、乃至娱乐当中不无矛盾地进行，也遇到了来自规定作法的压力。

准确地讲，主体为求发展、适应、成熟，以满足其环境的要求，必须学会不断地进行混血。不这样，培训和教育就将完全是空想。正是在对**相异性**的感知，甚至是在对**异化**的接受当中，在精神和社会方面得到开化的主体才单独地并集体地和互动地形成。同时，不管是否愿意，也要承认他人是自己的**界限**，从而结束了儿童时代“全能”的幻想。事情还远非如此：应该这样得到承认的，不仅是我自己主体性之外的他人，是对我加以合法抵御的我以外的另一个客体（尽管他对自己来说是主体）；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应该同样，甚至更要**承认和接受**的，正是因此摆脱了我所期望的控制的我身上的**陌生人**，他人。只要这个变化没有真正实现和完成，我们就会上当，那种排泄性的“投射”机制会使我们把不能和不愿承认是自己的东西赋予他人，使它在那里很容易地被猛烈的反作用力所摧毁。

如果可以从学科和跨学科认识论的角度合理地提出教育科学身份的问题，就必须永远不放弃该科学的复数性质以及它们必须继续保持的异质性。有几种“文化”在其中交会，寻求联系。因此，在无穷尽的教育实践当中，那些“范型”、“模式”、价值、规范、“法则”、习惯、实践、常规相互碰撞。在以后的生活中，教育首先是存在的，本质的天空的纯洁性感觉受到玷污也只能由他而去。规定、组织和机构的程序，获得文凭的制度，检查与评估，小组间的互动与人际交流过程，单独经验的数据与自身的塑造，构成了许多性质差异很大的范畴，关键是要把普通教育、职业培训和大学的知识与能力联系起来。只要这些教育机构不忘记它们的最终原则：在他们已经进入的领域里开发最大多数学生的批判能力，实现

目标，同时也符合开发职业技能和竞争力、促进劳动市场的调节等其它要求，就不会过多地放弃它们更加根本地瞄准的那些价值哲学的、伦理学的和质量方面的极点。但恰恰就是这个被瞄准的质量，在使它产生和发展的方式方面具有**主体间性**，而对它的完成来讲则具有**主体性**（即便是他人在其中占有位置）。复杂性与对异质性的接受密不可分。雅格布·伯克哈德（Jacob Burckhad）在敏锐地强调了所有专制在开始时都反对复杂性的同时，似乎也应该从异质性的角度阐发他的观点。因此，以上我们强调了生物学和人类学层面的重要性（不同于机器的型号），使用了适合这些领域的“联系”、“结合”、“关系”等词汇。要想使已经得到的具有异质性的收获的混合体能够被吸收和掌握，也就是说重新发明而不是再次发现，应该进行米歇尔·比道（Michel Butor）所说的“改动”，这种“变化”的混血在我们看来仍然是最漂亮的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教学、知识和技能的传递的狭窄层面。后者当然重要，但以异化为信号的教育过程的核心，是要使个人的、集体的、社会的主体重新占有这一传统的内容。

当跨文化的交会与交流（包含碰撞）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的时候，既当时间允许它们共同的和反差很大的，普遍、个体和个别的历史得以完成的时候，交会与交流就恰恰形成了这样一种混血。利用这一混血，大家都感到明显处于复数状态。陌生人（应该理解为在我们自身和之外）总是我们的“他人”（而不是我们的复制），他在促进相互创造的可能的同时，让我们知道在对面有无法逾越的界限。在这样的精神“交易”（取其 17 世纪的意义）当中，远东的思想开始窥测西方的技术理性，而西方则当然地在辩证性，至少是对话性的其他世界观当中，探寻线性和形式逻辑性都少一些，而更加全面的形式。可能双方私下都有野心，在借鉴工具的同时保存价值，既“思想”（东方）和“哲学”（西方）的特色。但是，尽管受到激烈的反对并面对对身份“相同”的厌恶，异化和混血却产生了另外的结果，出现了不折不扣的对他人的“摄取”（取其精神分析学的意义）。每次都是一个“新人（程度不等）”出现，他是复数的并且经历丰富。语言和文化在这个人身上不是重叠，不是吻合，不是混淆，不是融合，不是叠加，而是联系与结合。